

探寻中华文明返本开新之道

——评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

吴新文

近年来，姜义华教授积多年学术研究之功，先后出版了《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初版、2013年再版）、《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华文明的鼎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等著作，就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提出了一系列整体性、贯通性、创新性的论述。如何真正做到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观中国，探寻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之道，构成了姜义华教授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在上述著作中，姜义华教授从大量的史实和典籍入手，从哲学的高度，探幽发微，提要钩玄，勾勒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流变、开新的轨迹，阐明了中华文明的“根柢”和“经脉”系统，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完整、丰富、生动的中华文明形象。

一、关于中华文明的各种“陈说”和“怪论”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国内外学界存在着若干“陈说”和“怪论”。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如下几种。

猎奇式的中华文明论。欧洲近代早期的很多基督教传教士或学者，从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中华文明。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到过中国，接触了关于中国的极为有限的二手、三手资料，其中一些材料完全是道听途说，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异域的想象。他们的中华文明论，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多少带有评点博物馆或展览馆中的“文物”的味道。对于他们所处的欧洲世界而言，遥远的中华文明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陪衬或点缀。而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华文明多有肯定和赞扬，则主要是借中华文明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发泄对欧洲文明现实的不满。

启蒙式的中华文明论。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黑格尔等欧洲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也极为有限，他们从欧洲启蒙现代性的立场出发，批判中国或中国人的专制、奴性、停滞、僵化。这种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基础上的中华文明论说，就是以启蒙现代性为理论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西方式的科学？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这种提问方式，在启蒙式的中华文明论中，是必不可少的。

学科式的中华文明论。这主要是19世纪以来海外汉学或中国学所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论。这种海外汉学或中国学，无论是欧洲的、日本的还是北美的，都是它们自身的学术体系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增强自身文明的正当性，因此自然要把中华文明、中国或中华民族当作“客体”或“他者”来对待。海外汉学家或中国学专家热衷于从中华文明中

寻找自身文明中存在的某些文明元素，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肯定，大体上以不动摇自身文明的中心性和正当性为限。

学科式的中华文明论，更习惯于从自我中心的视角，发现中华文明的“特殊”“反常”甚至“怪异”之处，忙于“找错”，似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都成了问题。近年来颇为热门的从周边看中国论、中国是文明而非国家论、征服王朝论、扩张型帝国论、内亚边疆论、大一统反常论，就是海外汉学的中华文明论的典型观点。这些观点原来都是外国学者炮制的，但很多中国学者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并加以大肆宣扬。如国内有的历史学者认为，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产生的民族国家形式是正常的、普遍的，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而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式是特殊的、反常的，带来了很多问题，需要“转型”。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形式、中国的巨大规模、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似乎都不够“普世”，不符合“世界文明主流”，因而构成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原罪”。

信徒式的中华文明论。在近年来的国学热中，兴起了一股以政治儒学为旗号的儒家保守主义。这股思潮把中华文明等同于儒家文明，企图以传统儒家的政教体系对抗西方现代性，甚至对抗马克思主义，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革错了”，主张恢复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国学，甚至主张立孔教为国教。这种论述表面上看来坚持了中华文明立场，但实际上不过是把西方那种以宗教为文明核心的保守主义翻转一下，所遵循的仍然是西方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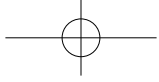
显而易见，上述中华文明论存在着各种缺陷和偏颇，充斥着很多傲慢和偏见，大多属于“人云亦云”的“陈说”或“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①。但时至今日，这些论调依然在学界大行其道，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遭遇特别是随后所形成的攻守之势不无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或西方化文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面前，很多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心切，在文明问题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副“势利眼”或“近视眼”。他们满眼是西方列强的所谓“成功”和中华文明的“衰败”，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震撼于外力，诱慕于外物”^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于是急功近利之心膨胀，急于改弦更张，邯郸学步，但其结果却是颠倒迷离，进退失据，而丧失了看待文明问题的整全的、超越性的视野。就如姜义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怀疑先前所做的一切，不断地批判中华文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试图全方位地找出先前各种差错，全面改弦更张。由于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么。”^③因此，这些人就不可能看清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及其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可能看清人类文明的全貌和发展“大势”，而是丧失了应对文明问题所应有的“自觉”和“自主”心态。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上整体地位的提升，上述心态已有所改变，但仍然有一批学者，陷入某种惯性思维而不能自拔，一味仰视西方，言必称西方，处于某种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被殖民”状态而不自知，不能做到以中国为主体，站在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或基本前提就是确认来自西方的各种名词、概念、理论、话语体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93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③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19—20页。



系以及思想、学术、文化的“普世”意义，并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以它们为崇拜对象，来衡量中国、改造中国，全盘否定或至少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从来没有想到观察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与西方不完全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独立的坐标系统。

对于这种现象，姜义华教授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我们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①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下去，不仅影响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全面、客观、准确认识，而且也会扼杀中华文明内在的创造力。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就是要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

二、中华文明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复合体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千头万绪，以何种视角、从何处入手把握中华文明，是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学界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大都从某一学科的视角出发，凸显文明的某一方面的内涵。如政治学的文明概念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历史学的文明概念重视文明的地域、民族和时代内涵，哲学的文明概念重视观念和思想的作用，而宗教学的文明概念则强调宗教是文明的核心。姜义华教授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视角，把文明看作是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所构成的统一体。这种意义上的文明是丰富的、立体的，也是不断变化和生长的。

任何文明都是由人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创造的。“中华文明名副其实是一个巨型的国家、依托一个巨型的民族创造的一个巨型的文明。”^②这一论断强调了中华文明与中国、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巨型”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能够经历很多磨难，而又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所在。姜义华教授从历史事实出发，把中华文明、中国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相对于国内外某些学者极力在三者之间制造“差异”“断裂”“对立”，故意夸大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性”而忽视其“中国性”的不良倾向，姜义华教授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的汉族，与创立了发达游牧文明、农牧文明的蒙、回、维、藏等族，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互相支持，有利于各民族自身的发展，早就建立了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统一国家，形成了彼此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③在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就自发成为一个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任何有说服力的中华文明论述都无法否认的正确出发点。

从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整体主义理解中，姜义华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中华文明的大判断：“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④这一界定揭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279页。

② 同上，第261页。

③ 姜义华：《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④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5页。

示了中华文明既多元一体又不断发展提升的面貌，破除了关于中华文明的很多“先入之见”或“一孔之见”。

比如说，很多人把中华文明等同于农耕文明，似乎游牧文明游离于中华文明之外，历史上的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满人，属于“蛮夷”或“外族”，并不属于中国人的范畴。但姜义华教授强调，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它甚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翼，对于复合型的中华文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上中国西南的各部落地区，经常被视为与中原文明相对的“蛮荒之地”，是农耕文明需要不断“开化”的区域，在文明意义上并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姜义华教授把中国西南的文明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命名其为山林农牧文明，并认为这种文明与中原和江南的农耕文明不能完全等同，在整个中华文明中也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起到了“一翼”的作用。这种观点必将更新人们对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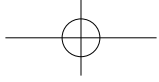
过去很多学者在评价中国的农耕文明时，常常把农耕文明和愚昧、软弱、封闭、保守、僵化、落后等文明性格联系起来。但姜义华教授断言，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轴，以精耕细作、安土重迁的小农定居经济为特色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不仅不是落后的，而且是领先其他很多文明的先进文明，正是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和稳定的家国共同体，并延续至今。

对于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是“本”，商是“末”，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手工业和商业一直是受到遏制和打压的，因此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不如西方发达。但姜义华教授注意到，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在中华文明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规模如此巨大的中华文明是无法调节和维系的，也是无法保持自身活力的。“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当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不仅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成为一个整体。”^①

与那种建立在西方启蒙现代性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叙事不同，姜义华教授始终强调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认为中华文明不断包容、吸纳并消化其他文明中的元素，故能成其大；中华文明能够根据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节自身，故能成其久。在他看来，中华文明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有其“根柢”和“经脉”。中华文明是不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明，不仅有过去，而且有现在和未来。

从中华文明不断成长的角度，姜义华教授概括了中华文明的四次“空间扩展”：第一次是中东部农耕文明与北方、西方的游牧文明以及西南方的山林农牧文明的交流、冲突、联合；第二次是与印度半岛的佛教和中国周边的日本、中亚、阿拉伯等地区的深入交流；第三次空间扩展，源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冲击；第四次空间大扩展，源于当前的全球化、大数据、互联网，它们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不确定性。姜义华教授所说的“空间”，既指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但更多是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文明的空间扩展，也是中华文明的质的不断提升。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根柢”与“经脉”

20世纪80年代起,姜义华教授对《礼记》、唐代李林甫主持编撰的《唐六典》和杜佑编撰的《通典》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同时策划和主持出版了百卷本的《中华文化通志》。他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时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想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性的、通盘的了解,特别是它的内在结构”。^①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最根本的特征?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华文明的“根”和“魂”,究竟在哪里?经过多年研究,他把“中华文明的根柢”归纳为三点:“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论’的国家治理体制;其次,是‘家国共同体论’下社会自我治理体系;第三,是中国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②而中华文明的经脉,主要是指整体性的中华文明所包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它与中华文明的根柢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首先,姜义华教授指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春秋大义”,如董仲舒所说,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即使历史上中国有时呈分裂状态,但这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为正统而实现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国政治的常态,“统一国家”和“统一和平”是整个中华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和主要支柱。

在姜义华教授看来,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是为了满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的需要而产生的。小农定居文明、精工细作农业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抵挡外来入侵的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提供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需要在大规模市场中进行经济交往,互通有无,调节资源和产品的分配。

大一统国家需要制度的支撑。姜义华教授强调:“中华文明传到今天,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柳宗元讲,这个制度建立是公天下的,使公天下变成实际的东西。皇帝可以私天下,每一个当官的可以私天下,都为自己,但是这套制度建立起来,已经天下为公了。它使公天下,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保证。而且推翻以后,它可以再重建。”^③这套制度的核心,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及与之配套的选举制、科举制。它们虽然在历史上也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弊端,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它们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封建格局,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特别是隋唐以后,郡县制与科举制相结合,同步实施,保证精英流动,既有效制约了中央集权,又制约了地方分离主义,防止地方豪强割据一方,使中央和地方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一直传承至今,适应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彼此交流、互补互惠的客观需要。

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上层人物受欧洲小国寡民的政治传统及其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漠视大一统政治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一味向西方看齐,企图以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

^①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②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135页。

^③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130页。

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旦接触中国政治实际，这些方案都碰了壁。实施这些方案，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冲突。

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无视国内外的历史教训，幻想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对此姜义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忽略了中国各地区早就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资源红利、资本红利、人口红利、科学与技术红利、教育与文化红利，以及生态与环境红利，只有在统一共享中，各地区方才能够形成真正的优势互补，彼此促进。改行联邦制，是强行将统一整体加以割裂，其实是走向封建割据，引导国家走向分裂。”^①

其次，与大一统政治密切相关的是“家国共同体”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姜义华教授强调，以农耕文明为主轴的中华文明始终以人为本，这是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所在。农业生产既需要考虑外部自然环境和气候，又需要重视人的自主劳动，强调“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而人是存在于家庭、家族、宗族、村落、地域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之中的，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等级差序为特点的家国共同体。“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个人、家庭、乡里、地方、国家、天下相互连接为一体的家国共同体，这是中国统一国家得以存在和延续最为广泛最为强固的社会基础。”^②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家”和“国”是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形成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社会道德、社会礼制、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以家庭伦理、家族伦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逐步向外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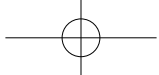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是建立在等级差序的结构之上的。正如姜义华教授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其确定的角色定位，这是共同体得以保持稳定的前提。但另一方面，在家国共同体中，权威与服从其实又都只是相对的，职责和义务也是相互的。人们的身份与地位又不是永久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转换、流动、升降、变迁，这就使共同体始终充满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家国共同体型社会治理的最成功经验，就是德治、礼治、法治三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即将道德、礼仪和法律结合在一起，而礼治则是沟通德治与法治的中介。“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维护和持续，与中国一直是一个礼仪之邦始终联系在一起。什么是礼仪之邦？就是家庭的伦理，乡里的伦理，个人与国家和社会联系的伦理，它具体表现在人们的礼仪中间。这套礼仪，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也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好，所有这些，都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准则和行为规范。”^③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就是为了防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物质关系、功利关系。这种家国共同体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相反，在西方的博弈型国家治理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化约为原子式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亲情、友情、审美、知识交流全部简化为产品交易关系，并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冷漠化、无根化等一系列弊端。

① 姜义华：《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第98—99页。

②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222页。

③ 同上，第189页。



最后，姜义华教授借用马克斯·韦伯关于心志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指出：维系大一统国家和家国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不是一神教宗教所推崇的心志伦理或意图伦理，而是以天下国家为已任的责任伦理，包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以及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这种责任伦理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的伟大动力所在。

与中华文明的三大根柢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中华文明的经脉系统，即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包括儒道墨法等各家，以及后来被中国引进吸收的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知识成果。姜义华教授指出，中华文明知识谱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语怪力乱神”，而是尊重人，把人的现实生活、实际交往放在整个学术体系的核心地位，重视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延续。由于在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中存在着各家各派的学说，中华文明具有广阔的知识和文化纵深，在指导思想上拥有丰富的资源。这些学说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交相为用，使得中华文明的家国共同体特别富有张力或韧性，能够通过自我调适，应对各种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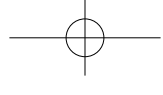
姜义华教授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现代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既充分吸取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优秀成果，又对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批判的产物。中国知识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精华的最佳切入点。”^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中，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实现了思想和知识上的升华。

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基本制度，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国基层，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对中国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趣味能产生直接影响，这也是中国的大一统国家能够延续至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姜义华教授特别强调，理解中华文明，要从基层着手，要多看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只要看一看春节时每家大门上所贴的春联就知道了。比如‘民富国强、人寿年丰’这八个字，把每个人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每个人健康长寿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几千年来支撑我们这个文明的中国人最简单、最朴素的核心价值观念。”^②

当然，把握中华文明的根柢，梳理中华文明的经脉，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以中国为主体、为方法、为尺度，也不是要排斥对其他国家和文明全面客观认识，而是要在真正的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自身的大历史观。“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确立一个大历史观，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了解，同时对世界历史包括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发展状况要有通盘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大视野里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中国历史出发，从文明史的角度，围绕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文明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94页。

② 同上，第266页。



成长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构建起我们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①“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其落脚点是阐明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之道。

四、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之道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未曾中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强调“革新”“鼎新”“出新”“开新”，是建立在“返本”“务本”“不忘本来”的基础之上的。“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所要革去的“故”和推掉的“陈”，不是文明赖以挺立的根本，而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腐观念、体制机制和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需要不断“返本”，守护自己的“根柢”。“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②中华文明的根柢或根本，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大的国情。在姜义华教授看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都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有效地克服了脱离或偏离中国实际、中华民族实际、中华文明实际的各种思想和做法之后，踏踏实实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不仅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全面、深刻把握之上，而且也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刻理解之上。他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奋斗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功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伟大践行者。”^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转型，使传统的大一统国家成功地实现再造和新生，传统的精神支柱——中华传统美德得到延续和升华，传统的家国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全新经济基础，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姜义华教授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不落俗套。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获得了两次解放，一是1949年成立新中国，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解放；二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思想上，从原先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中获得了解放。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又与其对中华农耕文明的优势和世界产业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耕文明内在力量的激发和重组，使之成为中国建成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所创立的中国模式真正的基本点。”^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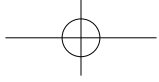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一种“返本开新”。“社会主义具有经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221页。

②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第3页。

③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98页。

④ 同上，第99页。



济性质，更具有文化性质。社会主义是创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不仅包含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先进的思维方式、先进的交往方式、先进的行为方式。”^①

对于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文明，姜义华教授一方面肯定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论意义，但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全球化绝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恰恰会使世界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不可能实际参与全球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全面享有其成果”。^②为了把资本、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姜义华教授特别指出：“工业革命需要资本，需要资本的积聚与积累，也离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但要产生资本，实现资本的积聚与积累，乃至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途径。事实表明，人们还可能做出其他许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必要和必然。”^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中，改革开放是利用资本主义以成就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具有鲜明的文明论意义，因为改革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是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运动。虽然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主动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是整个中华文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政治文明到社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全方位的提升，是人类文明中一种崭新文明在孕育、在诞生”。^④

姜义华教授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遭遇各种困难和风险。“近代以来，对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真正最大的冲击，其实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以及现今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化、信息化。”^⑤在当代世界，全球经济正在从传统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产业经济转向以知识、文化、科技、信息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经济，知识、文化、信息的霸权及鸿沟正深刻改变着全球竞争、全球控制、全球治理的态势和方式，文明问题日益凸显。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一直具有双重面向。姜义华教授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现代性的“中国重撰”，以中国为主体，在中国书写现代性，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断重写，其间既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延伸和接续，又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抗和叛逆，既蕴涵着对前现代诸传统的否定和断裂，又坚持着对前现代诸传统的承续和贯通，它从一开始就与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努力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将来还将继续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现代性重撰”的过程中，姜义华教授呼吁要培育一种新理性主义，以保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戡天役物的竞进精神与自然谐适的保守精神、世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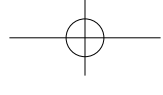
①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 60 页。

②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第 257 页。

③ 同上，第 255 页。

④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 59 页。

⑤ 同上，第 24—25 页。



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的并行不悖、相砺相长，并以此规范人自身，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三者相契合而成为整体。他相信：“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以及新理性主义的勃兴，使中国有能力纠正社会大变革中的种种负面效应和种种失序、失衡、失范现象。”^①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中国正在谋求融新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为一体的新文明，要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弊端，就要自觉做到以人为本，“推进工业化进程与生态化的结合，城镇化进程与人性化的结合，市场化进程与社会公平化的结合，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结合”。^②

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实现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结合，意味着在继续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能因此转为崇奉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而恰恰是在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广泛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人看来，文明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中国秉承“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核心价值，继续发扬协和万邦、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国与国交往以德以义而不是唯利是图等优秀传统，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够有效克服资本主义霸权所造成的世界的二元对立状态，以及世界联系和交往中的极严重不对称性，并努力克服许多蕴含着极大危险性的世界联系的疏远、脱钩乃至断裂。“中国坚定不移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以不同文明等价共存和互尊互鉴，抗衡国际关系中仍然到处可见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秩序构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倡导者。”^③

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既有历史事实的梳理，又有历史哲学的理论阐述；既有对过去历史的规律性总结，也有对现在和未来文明发展态势的精当分析和科学预判；既有对中华文明的“了解之同情”，也有对世界文明的卓越洞见。对于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未来，姜义华教授表现出了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睿智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具有的乐观态度。他预言：“中国今天已深度进入全球化，并一步步从边缘半边缘走向世界性联系的核心。中国将成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立足这样一个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将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将在应对中国和世界这一全新挑战中谱写出崭新的篇章。”^④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① 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②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第214页。

③ 姜义华等著：《中华文明的鼎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④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100—101页。